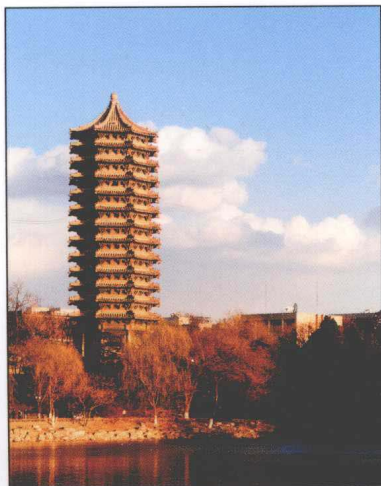


北大讲座

第二十二辑



《北大讲座》编委会

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 林毅夫

像水一样的生命流过 / 俞敏洪

创新的未来 / 李开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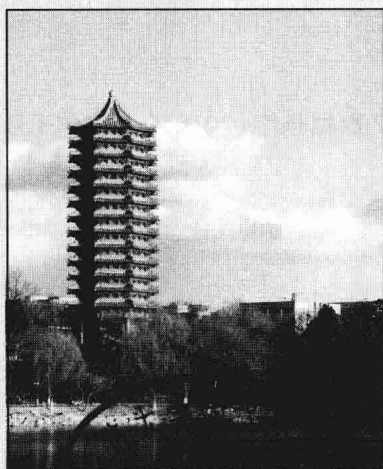
谈社会正义 / 陈少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讲座

第二十二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讲座. 第22辑/《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301-17404-3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②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1618号

书 名: 北大讲座(第二十二辑)

著作责任者:《北大讲座》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胡利国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7404-3/G·289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hlgws0380@sina.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26754962

编辑部 62765016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9.5印张 250千字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北大讲座

季羨林

《北大讲座》编委会

主 任：周其凤

副 主 任：张 彦

成员单位：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教务部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讲座》(第二十二辑)编委会

主 编：吕晨飞

副 主 编：孙力强

执 行 主 编：黄 冠

执行副主编：胡 吉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大林	孙 伟	孙宪明	孙 硕	朱琴怡
张一哲	何方竹	何孟奇	苏清虹	杨 鹏
李 震	赵子含	金文丹	罗杨星辰	林 雯
俞文秀	胡世能	胡 明	姚佳程	栗 征
徐 杰	高婧妍	彭晓畅	雷 蕾	薛 元

目 录

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林毅夫(1)

演讲者是这样说的:(1)在场的每一位都跟我一样,非常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冠军文化。(2)中国的每个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思索:中华文化,这个曾经是冠军的文化是不是能够再度辉煌起来,又变成一个冠军的文化?(3)一个强势文化指的是什么?强势文化指的无非就是经济基础好。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推动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现代化。即使这样,我们还要努力,争取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到那时,我们今天的讲坛所追求的冠军这个奖杯就会有回到我们的手中。

像水一样的生命流过 俞敏洪(19)

演讲者是这样说的:(1)我认为能否对得起自己的一辈子,绝对不是一个名次的问题,而是一个你到底有没有勇气继续走下去的问题:有没有勇气在别人讽刺你、打击你的时候走下去;有没有勇气在整个社会都看不起你的时候依然走下去。(2)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冠军在未来都有可能被人超越,任何人跑出的速度在未来都有可能被另外一个人以更快的速度超越。但是,任何一个人的精神,另外一个人是不可能取代的。每个人的精神都是一种人格,每个人的精神都是一种坚强,每个人的精神都是一种勇气。(3)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如果仅仅是公立大学,还缺乏一些挑战。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会像狼一样跟在后面,能把北大、清华的速度真正提起来。

创新的未来 李开复(44)

李开复先生以“创新工场”为例来论创新。他看到了中国三个即将爆发式

成长的机会。他想把握住这个爆发式的成长,一个做五个可行的、有用户和商业价值的创新。这三个巨大的机会就是地利、天时与人和,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在这两年之内爆炸式成长,带来巨大的缺口和机会。

社会系统·关系运作·权力结构 翟学伟(56)

(1)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视角及其可能的途径;(2)中国社会的构成及其系统;(3)由图式推导出中国社会系统与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关系;(4)中国人关系的向度及其运作;(5)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

当前经济形势与经济宣传 高云才(87)

大人物 小人物

——走进真实生动的人物访谈 徐 泓(110)

徐泓老师演讲的内容主要来自于她的采访实践,来自于她做记者时与各种人物的接触,侧重于采访过程中的故事和《大人物 小人物》这本书所涉及的众多人物。

开始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梁钦元(132)

(1)转变:你别无选择;(2)理想与目标:寻找登天梯;(3)自我意识:成为自己;(4)适应:你在他乡还好吗?(5)关系:让我们真诚地握握手;(6)兴趣美好:心理“减压作用”。

信息产品、信息社会与中国的历史责任 阙凯力(159)

(1)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2)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说起;(3)信息产品的经济学特性;(4)经济学必须研究信息产品;(5)信息技术是人类最高生产力;(6)信息社会是人类的最高历史阶级;(7)向信息社会过渡必须经历四项革命;(8)中国的历史责任。

异化:社会治理的不道德原则 王海明(176)

谈社会正义 陈少峰(194)

陈少峰老师讲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正义问题。

重返先锋:文学与记忆 苏 童(208)

作家苏童先生对他的生活经历和记忆、对人生的感悟与文学的关系作了精彩的演讲。

如何走进经济学的大门	胡 涛(226)
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终结与我国的对策	苏 剑(243)
(1)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宿命;(2)金本位制的崩溃;(3)我国的应对措施。	
巴菲特、索罗斯、比尔·盖茨成功的比较	廖理纯(251)
天文望远镜的发展和成就	苏定强(270)

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 林毅夫

〔演讲者小传〕

从台湾政治大学到美国耶鲁大学，他完成了一位学者的“独善其身”之路；从国务院发展中心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实现了一位学者“忧济苍生”之抱负；从北京大学教授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他开拓了全球化时代“平天下”之伟业。在中国经济力量异军突起的历史大势下，他用经济学大师的智慧，为改革开放的中国之船指点迷津，为掌舵者出谋划策。林毅夫——兼具学者情怀与社会关怀的中国经济人，他说：“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林毅夫：

应邀来冠军论坛作报告，我感到非常荣幸。开始的时候组织者让我讲我自己成功的故事。我想了半天，我个人每天所做的跟各位一样，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有些成绩的话，无非就是我运气比别人好，同时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所以才能有一些成就。那些成就我不敢个人居功，所以也没有什么个人的心得体会可以跟各位交流。但是，我想在场的每一位都跟我一样，非常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是世界的冠军文化。当然，我们在近代落后了，但中国的每个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地思索：中华文化，这个曾经是冠军的文化，是不是能够再度辉煌起来，又变成一个冠军的文化？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我的题目跟今天的冠军论坛也是契合的。

我想讲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我们大家知道，就像我刚才讲

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化确实是在同一个时代里最先进、最优秀的文化。长期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一般的看法是:在公元前 25 年到公元 220 年,中国是汉朝,是汉唐盛世中的一个盛世;在欧洲,罗马帝国刚刚建立,也是西方文明的鼎盛时期。我们知道,西方罗马帝国经过三百多年,就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西罗马在公元 476 年灭亡以后,整个欧洲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黑暗时代。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小城邦,这些小城邦基本上都是一个自然经济体,城邦跟城邦之间交往不多。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里面所讲的推进经济发展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分工。分工越细,生产力水平越高。他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针工厂的例子:如果一个工人把一根针的十个工序从头做到尾,一天能生产的无非是十几根针;要是十个工序分别由十个工人来做,每个人专门负责一个工序,那么十个工人一天能生产几千根针。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分工细当然比较好;可是,分工能细到什么程度是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能力就是修路。如果你今天到欧洲去,还可以看到一些罗马时代所遗留下来的道路的古迹。那时市场的规模大,但变成封建的自然经济以后,市场的交易量大大减小,因为市场就局限在封建贵族所统治的一个很小的自然经济体内。一个很小的自然经济体里面可能就有几千、几万人,顶多十几万人。在那种状况之下,如果分工很细,一天能生产几千根针。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每天来买针,所以分工就退化了,生产力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是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发现的。

而中国从汉朝以后,虽有分分合合,实际上大多数时间还是维持着大一统的局面。因为维持大一统,所以市场的范围就大,分工就细,生产力水平就高;而且在社会上技术的发明主要是以经验为主,而中国人多,工人和农民多,经验也就多,所以中国的技术发明也同样领先于西方社会,像四大发明,被培根(Francis Bacon)认为是“帮助西方社会走出封建时代”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张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这种分工细、科技水平相对高的状况下,中国曾经有将近一千五百年的时间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是一个历史文化绵延不断的国家。

当然,这种情形在工业革命以后就发生了变化。西方有一位学者叫

做奇波拉(Carlo M. Cipolla),他在《欧洲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得出一个结论说:跟中国比较起来,西方处在黑暗时代。公元1000年到1700年的欧洲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而中国是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但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年以后,把西方换成中国,中国换成西方,同样是一个合适的描述:和西方比较起来,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经济。它的后果当然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再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被迫割地、赔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挑战。那么,怎样让中国再次复兴起来,这是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下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先辈曾经努力过,奋斗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到了五四时期,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文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所以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不少人主张全盘西化,认为我们只有把西方的文化,包括它的核心价值等移植到中国来,中国这块土地才会有希望。从那时起,抱这种看法的大有人在。

改革开放到今年是30年。在这3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经济确实取得了原来大家没有预想到的快速发展,每年平均达到了9.7%,这确实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提出的目标是20年翻两番,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7.2%,而我们实现的是9.7%。所以在人口这么多、条件这么差的基础之上,能够维持30年这样的发展,确实是不容易的。

这30年来的发展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作为关心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前途的人,我们还是要问:经济的发展是否代表文化的复兴?这是一个问题。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否和现代化相融?是不是必须像过去那样打倒孔家店,中国才会有前途?是否必须全盘西化,我们才能进步?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命题。

既然讨论文化和文化的复兴,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什么叫文化。根据《汉语大词典》里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且这种物质财富跟精神财富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当然这个定义跟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加上上层建筑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讨论文化复兴的时候,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的是费孝通的

老师、著名文化学者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的定义。他把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器物,包括生产工具、战争的工具、武器等等,当然这是马克思所讲的经济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组织的层级。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人们把属于器物的东西组织起来生产,形成经济组织,或是进行对内对外交往,形成政治组织。当然人跟人之间还有其他各种组织的方式。第三个层次是价值、伦理的层次。也就是说,这些器物、这些组织,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的社会判断和终极关怀是什么。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任何文化都是这三个层次或这三个因子的有机结合,而且任何一个文化在没有外来冲击的时候,这三个层次实际上会成为一个自恰的整体。

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分析。在原始公社里,当时的器物生产工具是石头,组织是公社,价值是公有共享。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层次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是自恰的。当时的工具是石器,生产力水平非常的低,你用石头,不用说是打老虎,打狮子,就是要打一头野猪,都不容易啊。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状况下,人跟野兽在斗争的时候,经常会打不过野兽,因为它跑得比你快,它的肌肉比你强壮。那么在那种状况之下就形成一个公社。市场是有规模经济的,如果要出去打猎,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样打到猎物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那时的价值是公有共享的,这跟生产力水平很低有关系。这个公社里面一群人出去打猎,今天打到了,而另外一群人出去没打到。猎物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没办法保存的,即使不吃的话也不能储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打到了猎物,但是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还打到猎物。那么这种状况之下最好就是公有共享:当你打到猎物的时候,你分给别人;当别人打到猎物的时候,你有同样的权利去分享他的猎物。这实际上是通过规避风险、相互协作来争取大家相处的最大可能性。所以,在当时那么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所形成的组织形态跟它的价值理念其实是自恰的。当然,随着工具的改进,从石头到铜器、铁器,生产方式从游猎变成农耕,生产变成可以预计的。

我们常讲,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只要在春天的时候努力干农活,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有收获,而且收获以后可以储藏。在这种状况之下,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的组织形态是公社,后来慢慢就变成了家庭。在公社的阶段,你出去打猎回来以后大家共享,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讲,难

免就会出现一些偷奸耍滑的人,每次出去打猎的时候不好好干,回来的时候却跟大家共享。那如果变成家庭生产的话,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你努力就多得,这样就有利于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为自己负责。而且价值也跟着改变,过去是共享,现在变成私有了。以家庭为单位且财产变成私有,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我春天夏天的时候努力,秋天就有收获,而且我可以再努力一点,在丰年的时候多收一点,天灾人祸的时候就可以靠我的储藏渡过难关。当然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跟现在比较起来是很低的,所以在上层建筑中有一些新的比较复杂的安排,比如说它有氏族,有血缘的联系。在同一个氏族里面,虽然每一家都是私有的,但是在有血缘的亲戚之间还是有相互帮助的义务。而且在农耕社会里,要解决灌溉问题,在家庭、氏族之上还会有国家来满足灌溉、水利等的需要。所以,在一个长久存在的文化实体里面,它的生产力水平、组织跟价值是一个自洽的整体。

当我们了解了文化跟文化的内涵以后,要谈中华文化的复兴。所谓复兴,就是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落后的文化。而什么是先进的文化?这是必须先回答的问题。我们要讲文化的复兴,也必须解释什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如果不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那就无所谓复兴不复兴;如果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话,哪有什么复兴?所以,我们就必须了解:什么是先进的文化?什么是落后的文化?什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

首先,什么是先进的文化?我想,说一个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实际上是相互比较而言的。我前面谈到,在前现代社会,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前,在将近1600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先进的文化;而在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则变成一个落后的文化。那先进与落后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来比较的呢?两个文化相碰撞、相冲突的时候,会在我前面讲的三个层次上表现出差异来。比如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在我们所看到的器物这个层次上,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西方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我们还用弓箭、长矛,西方已经是铁甲船、大炮。在组织层面,从政治上来讲,我们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而西方不是民主共和就是君主立宪。从价值层面来讲,中国绵延不断的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西方则是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三个方面确实都不一样。

当这三个方面确实都不一样的时候,先进与落后指的又是什么呢?从上层建筑来看的话,能不能把两国分出高低呢?我想从最上层的核心

价值体系来看,确实很难分出高低,比如说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共享与农耕社会里面的私有,到底哪个好?各有利弊。真正能够比出高低的,应该是在经济基础下面的器物的层次,也就是生产工具、战争的工具等等。比如说,以两次鸦片战争为例,中国还在用大刀长矛鸟铳,而西方已经是洋枪大炮。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以四千左右的兵力使清朝十几万军队疲于奔命,屡战屡败。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两万人打进北京城,把圆明园都烧了。那么,洋枪大炮跟大刀长矛的效力水平差距到底有多大呢?英法联军一共两万人左右,英国一万两千人,法国八千人,投入战争的大概就是五千人,而清朝的一个猛将僧格林沁所率领的军队有三万五千人。但是战争的结果是,清军死亡过半,死了将近两万人,北京城失守。为什么?不仅仅是武器不如人家,军队的综合素质也相距甚远。

生产工具也是一样,当我们还在用耕牛的时候,发达的国家已经在用拖拉机。耕牛跟拖拉机的差别是:一个农民如果用耕牛进行生产,除了养活自己之外,再顶多养活不到一个人;如果用拖拉机的话,一个农民的生产,不仅能养活自己,还可以养活数十个人。所以我们在比较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时,真正比较的是经济基础。这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

第二,什么是绵延不断的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绵延不断文化的民族?当我们讲一个民族的文化绵延不断的时候,当然是指有些民族的文化消失了,比如说埃及、罗马、希腊、巴比伦。这些也都曾经是世界闻名的古国,现在住在那些地方的人,有不少确实也是七千年前、五千年前或是三千年前那个文明鼎盛时期的人的后裔。但是我们说它们的文化消失了。到底消失的是什么?同时我们讲中国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文化,那么这绵延的文化又指的是什么?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果说中国有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她的经济基础到底有没有变化?经济基础确实不断在变。比如说中国曾经有四大发明,这是生产工具上的变化。在这之前,地球上没有火药,没有指南针,没有印刷术,没有纸张。这些发明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而且,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公认在宋朝的时候,在公元960年到1279年这段时间,曾经有一个技术发展相对快速的时期,有些学者还把它称作中国的工业革命时期。这样讲起来的话,绵延不断的文化绝对不是说你的经济基础不变。经济

基础确实是在不断变化。

那从组织的层面来看,到底有没有变化?也在变。我们一般讲儒家的文化,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及以后代代相传。但在周朝的时候,经济组织是井田制。井田制实际上是很接近于农奴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因为中央的公田是贵族的,旁边的农民要负责帮他们耕田,作为对于封建主的一种义务。这与欧洲黑暗时代的封建制度是非常接近的。但是从秦朝开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从汉朝以后,劳动力也可以自由流动。到明朝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被称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山西长治县有煤有铁,所以铁的冶炼非常发达,农具生产也非常发达。根据学者的研究,当时长治县生产的农具就达到七十万套,远销东北亚的朝鲜,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地。想一想,要生产七十万套农具要多少工厂,工厂要雇多少工人?所以那时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确实已经出现,经济组织的方式是发生了变化的。从政治组织来看也是变化的。周朝的时候是封建社会,但是到秦朝,设立了中央集权,汉朝以后一直继承这种方式,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经济基础在变化,经济和政治的组织方式也都在跟着相应变化。那么,真正绵延不断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绵延不断的无非就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价值的伦理体系。可以说,从文王周公以后,这个“仁”一直是中国社会是非判断的标准。“仁”是什么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从自己的心出发,把别人当作是你的一部分。我们说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脸,这是我的头发。为什么你说这些是“我的”?因为你能感觉到它,所以它是你的。但用儒家的话来说,我们的心不仅能感觉到自己,我们还能感觉到别人,即所谓感同身受。我们看到汶川大地震中死了那么多人,那些人我们不认得,他们不是我们的亲戚,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的内心一样经受煎熬,这就是所谓“仁”,不忍之心。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的灾难,你会感受到像是自己的灾难一样;你要避免灾难,还要帮助别人避免灾难;你想自己有成就,你也希望别人有成就;你所不喜欢的,希望别人不要加在你身上,所以你也不把这些加在别人身上。

人类社会不断发生变化。西方社会由原来以封建地主和农奴为主的

经济,变成现在的工业化大生产,政治上由君主专制转变成现在的民主共和,这些都变了。为什么我们还称它为西方文化?不变的是什么呢?西方文化一直坚持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价值,这个没有变。而我们绵延不断的中华文化,其实指的就是以儒家的“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个内涵几千年一直保持下来。

根据这样的理解,要谈中国文化的复兴,我想是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在经济基础方面,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不是能够支撑起经济基础,也就是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组织层面上,不管是经济的或者政治的组织,能不能跟经济基础所需要的规模相适应?第三,在核心价值方面,在经济基础不断强化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社会政治组织变化的过程当中,这个核心价值还能不能保持,能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动调节体系?

我想要回答的无非是这三个问题。从经济基础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固然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已经有每年9.7%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技术、从产业水平不断提升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潜力应该还很大,还可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我在许多场合讲过这个观点,中国完全有可能再继续保持二三十年像现在这样每年9.7%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这里边讲的是可能性。长期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可以看到,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以西方为例,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一两千年里,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是0.05%。它的含义是什么?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工业革命以后,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第一个一百年是平均每年1%,以后这一百多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2%。1%是什么含义?每7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2%是什么含义?每35年人均收入翻一番。为什么会从工业革命以前的每1400年人均收入才翻一番变成工业革命以后的每70年到现在的每35年人均收入翻一番?关键就是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加快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加快。而中国还是继续用工业革命以前的以经验为主的方式来从事生产活动,这样我们才会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从领先于西方、领先于世界一下子变成落后于西方、落后于世界。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当然最重要的还是